

西方哲学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主编 ◎ 刘放桐 俞吾金

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张庆熊 周林东 徐英瑾 ◎ 著

哲

人民出版社



古希腊罗马哲学

Philosoph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Philosophy in Middle Age and Renaissance

十七世纪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in 17th Century

十八世纪启蒙哲学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18th Century

德国古典哲学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Modern to Contemporary Times

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

German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

French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ISBN 7-01-005108-9



9 787010 051086 > 7-01-005108-9 定价: 62.00 元

西方哲学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主编◎刘放桐 俞吾金

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张庆熊 周林东 徐英瑾◎著

人民出版社

第 一 篇
分 析 哲 学

第一章 分析哲学篇导论

分析哲学顾名思义是注重分析的哲学。分析哲学家普遍重视分析。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在他的一本自传中写道:“自从我抛弃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来,我一直寻求通过分析去解决哲学问题;并且我仍然相信,惟有凭借分析才能取得进步。”^①在他所写的《西方哲学史》中,以“逻辑分析哲学”为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概述他及其同道重视分析的哲学在整个哲学史上的地位:“以上我谈的是现代分析经验主义的梗概;这种经验主义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数学,并且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从而对某些问题便能得出明确的答案,这种答案与其说有哲学的性质,不如说有科学的性质。现代分析经验主义和体系缔造者的各派哲学比起来,有利条件是能够一次一个地处理问题,而不必一举就创造关于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论。在这点上,它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相似。我毫不怀疑,只要可能有哲学知识,哲学知识非靠这样的方法来探求不可;我也毫不怀疑,借这种方法,许多古老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②

① Bertrand Russell,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我的哲学的发展》),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1959, p. 14.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95页。

当我们说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问一个问题:难道其他的哲学家不重视分析吗?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可以说自哲学产生之日起,分析和综合就同时并存为哲学的基本方法。没有分析也就谈不上综合,没有综合就无从进行分析。综合有助于总结知识和产生新的概念,分析有助于澄清概念和疏理知识。哲学作为一种爱好智慧的活动总是要依靠分析和综合这左右两只手。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说,有的哲学家更善于用分析,有的哲学家更善于用综合,正如有的人习惯于更多地用右手,有的人习惯于更多地用左手一样。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受到经验科学更多影响的哲学流派,也有受到数学和逻辑更多影响的哲学流派。前者着重于使用综合的方法,后者着重于使用分析的方法。这表现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以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传统强调对经验知识的综合,以笛卡儿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传统强调对概念的分析。罗素称他所代表的新的哲学运动为“分析的经验主义”,旨在表明,这一运动具有经验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唯理论传统中的重视逻辑分析的特点。并且,它结合了现代数学和逻辑分析的技术。传统的经验主义配备了这种有力的分析技术后,它的左右两只手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不仅在于他们的分析配备了现代的逻辑技术,而且在于他们视分析为哲学的基本任务。这是早期的分析哲学家提出的一个新观点。他们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追求真理,哲学的任务是澄清意义。为追求真理,需要通过经验观察和归纳建构科学的理论,并通过科学实验来证实或证伪这样的理论。为澄清意义,需要对这样的理论进行分析。哲学就是一种澄清意义的活动。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话来表达:“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可以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

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①用罗素的话来表达：“每一哲学问题，当我们给以必要的分析和提炼时，就会发现，它或者实际上根本不是哲学问题，或者在我们使用逻辑一词的意义上说是逻辑问题。”^②这与传统哲学的观点有极大的不同。传统哲学认为，哲学是人类全部知识的总结，因此他们建构包罗万象的知识的体系，创造关于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论。在经验知识还不具备的地方，他们就以思辨的原理取代它。他们甚至认为，完全凭借纯思辨的理智，就能建立一套绝对无误的知识原理。分析哲学家则认为，这种脱离经验的思辨只能产生无意义的命题，它们不但无助于科学知识，而且有害于科学知识，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为此就需要通过分析来消除这样的混乱。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建构知识的体系，而在于澄清已有的知识体系中的命题的意义，在于一次一个地处理问题。这就是分析哲学家视分析为哲学的基本任务的原因。

怎样来进行分析呢？分析哲学的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二种类型：一种是人工语言的分析方法，另一种是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人工语言的分析方法开创于弗雷格（Gottlob Friedrich Ludwig Frege, 1848—1925）和罗素。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罗素早年潜心研究数学基础问题和数理逻辑，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是现代数论和数理逻辑方面的经典之作。他认为这种数理逻辑的方法可以并必须被应用到哲学分析中去。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开创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摩尔是罗素在剑桥大学的同事。他在研究古代经典文献方面有专长。他认为在解读古典文献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是古代语言的用法与现代语言的用法的区别，在分析哲学问题的时候同样要注意哲学语言的用法与日常语言的用法的区别，他强调尊重常识和语言的日常用法。

①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页。

② 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人工语言的分析派主张,既然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那么我们就创造出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来,即创造出一套数理逻辑化的符号系统来,在这种语言中,每一个符号都有一个确切的含义,每一个句子都按照严格的规则建立起来。有了这种人工构筑起来的理想语言,就不怕日常语言的含混和歧义,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衡量工具,从而防止日常语言所可能引起的对语言的逻辑形式的误解。

日常语言的分析派则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不可能创造出一套完全能够代替日常语言的人工语言来,人工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翻译日常语言。因为语言并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创造的,语言跟人们的生活形式密切相关,有多少种生活形式,就有多少种语言形式,甚至语言本身就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生活形式是十分丰富和不断发展的,因此日常语言也是十分丰富和不断发展的,任何人工语言都不能有这样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都不可能跟上生活形式的发展。因此语言分析不是用一种人工语言去校正日常语言,而是在日常语言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指出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的最初用法是怎么样的,人们是怎样学习这个词或这个句子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是怎样曲解它们的用法的等等,来帮助人们理解词或句子的正确用法。

人工语言的分析派一般主张由繁到简的分析,它把复杂的命题化简为简单的命题,把复杂的概念化简为简单的概念;或者反过来,用简单的命题构成复杂的命题,用简单的概念构成复杂的概念。

日常语言的分析派对此则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无所谓分析的最终的简单成分可言,一个命题或一个概念,在一种上下文中是简单的,在另一种上下文中就可能成为复杂的了。因此他们认为分析主要不是化简,而是释义,是把一个句子或一个词与其相仿的或相反的句子或词相比较,在这种比较中理解这个句子或这个词的用法和意义。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哲学、维也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0)的哲学属于人工语言的分析派。摩尔的常识哲

学、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以赖尔(Gilbert Ryle, 1900—1976)、奥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 1911—1960)、斯特劳逊(Peter Frederick Strawson, 1919—)等为代表的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属于日常语言分析派。

分析哲学家在本体论上的立场不尽一致。有人持主观经验论的实证主义的立场,有人持实在论的立场,有人持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有人认为本体论的问题是一个可以通过语言分析取消的形而上学的伪问题,有人则同样通过语言分析表明本体论问题的科学含义。总的来说,在人工语言的分析派中,早期的主要倾向是实证主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分析哲学的中心从欧洲转入美国后,实用主义成为其主要倾向。在日常语言分析派中,主要的倾向是实在论和自然主义。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分析哲学也表现出一种与后现代主义相呼应的倾向,如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 1931—)宣告,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已经终结。但时至今日,分析哲学依然是英美哲学课堂上讲授的主要哲学,并且在哲学杂志上分析哲学的文章依然络绎不绝。分析哲学可能太专业化而偏离大众的兴趣,但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

分析哲学与其说是一个哲学派别,毋宁说是一场哲学运动。它没有明确规定的共同原则和目标,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有严密组织的学术团体。尽管我们可以列举出这一运动中的诸多代表人物和某些松散的小团体,但他(它)们不是统一的,存在很多差异,在某些方面甚至尖锐对立。这一运动处于演变的过程中,其哲学观点不断发生变化,其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也呈现出多样性。尽管如此,分析哲学运动仍然在总体上表现出与其他哲学运动相区别的地方。在许多哲学史家看来,“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是分析哲学运动的动因和分析哲学的最基本的特征。

罗素在其《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一书中视语言转向为“代表

着类似伽利略带给物理学的那样一种进步”。^①

自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把他在哲学上的转向譬喻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以来,“转向”已经成为哲学家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在对行星运动现象的解释上,哥白尼建立了新的天文学模式,主张地球绕太阳运动,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运动,这逆转了传统的托勒密的地心说的理论框架。在康德看来,传统的认识论研究我们的意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活动)如何认识对象,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对象上,没有想到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考察一下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康德主张人的先天的认识结构决定了人的认识能力的范围和限度。因此,要真正解决认识论上的问题,必须进行一次研究方向上的彻底转变。

康德的成就自然无可非议,但人们仍然有必要对康德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1) 你怎么知道人的意识有先天给予的形式(die a priori gegebene Form)?

(2) 如果人的意识果真有这样的先天给予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人类群体和不同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时空观念、因果观念等实际上是不同的?

对于前一个问题,康德也许会回答,我通过考察自己的内在认识活动而发现这一点。但是一个人的认识活动,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总是跟语言联系在一起的,人并不能纯粹地观看到认识的形式,而总是不可避免地观看到与语言相伴随着的认识的形式。因此与其说从考察自己的认识活动中发现认识的形式,毋宁说从与认识活动相关联的语言中发现了认识的形式。

对于第二个问题,或许在康德所处的时代,他仍然有理由相信这种

^① 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2页。

先天认识形式是全人类普遍共有的。但是随着新的研究和发现,特别是通过对原始部落的人类学的深入考察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时空观的建立,这种认识形式的不同性已经得到充分证实。

于是人们不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停留在刻画人的认识的先天形式的层次上的认识论研究仍然是不够的,甚至如同不反思人的认识形式的认识论研究一样,两者都是独断论的;一个在认识论上的新的突破是从认识形式的层次深入到语言结构的层次。有关人的认识形式的主客关系、因果关系、时空关系等问题是与语言学上的主谓关系、意指和所指的关系以及对“因为”和“当”等词语的使用相关联的。我们虽然不能说人的语言的语法形式决定了人的认识的形式,但我们至少能够说通过研究这些语法形式有助于了解人的认识形式。此外,人的认识活动不是纯粹内在的。人是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的交流中认识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语言是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进行交流的媒介,语言具有公共性和主体际的可考察性。因此通过研究语言,不但有助于了解自己的认识形式,而且也有助于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类群体的认识形式。所以在分析哲学家看来,这一“语言的转向”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样,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分析哲学家虽然都认为语言与哲学之间关系密切,但在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大致地说有以下五种:

一、哲学所热衷讨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由于误解语言而产生的,通过澄清语言,可以消除这些问题。因此哲学应成为一种语言批判,通过这种语言批判不是达到这些哲学问题的解决,而是达到这些哲学问题的消除,因为这些哲学问题本来就是伪问题。这一观点可以被称为哲学问题的语言消解论。

二、世界本身无所谓事实和真理。所谓世界的事实和真理只是语言学的事实和真理。语言的句法形式或命题的形式决定了什么是事

实,以及什么是简单事实和复合事实;真理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这一观点可以被称为哲学问题的语言决定论。

三、世界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这种相同结构是我们谈论世界上一切问题的可能性的前提。我们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的世界的界限。对于为什么世界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的问题,是一个不可以问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对之保持沉默的问题,因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超越了我们语言的界限。如果说康德的哲学可以被称为认识论上的先验主义的话,那么这一观点就可以被称为语言学上的先验主义。

四、世界本身存在着事实和真理,即存在着超语言的事实和真理。语言能够正确地或歪曲地表述这些事实和真理。因此澄清语言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表述和解决哲学问题。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的实在论的观点。

五、当我们决定建构或采纳某一种语言系统的时候,我们就蕴涵着承诺与这种语言系统相对应的世界的事实和真理。不是说世界存在着其本来的事实和真理,也不是说语言本身决定了世界的事实和真理,而是说我们的实用的目的决定了我们对语言系统的选纳,从而也就决定了我们关于什么是世界的事实和真理的看法。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上的实用主义的或相对主义的观点。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分析哲学家在对待哲学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激进的,有较为温和的。在分析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前期的分析哲学家持激进态度的较多,而后期的分析哲学家看待问题逐步全面和深化,持激进态度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有这些差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分析哲学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总是以语言为入口,通过谈论语言来谈论世界,通过分析语言来寻找哲学问题的症结。因此,“语言转向”成为分析哲学最基本的特征。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 1931—)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分析哲学的论文集,取名为《语言转向》。罗蒂在为该论文集写的“导言”的一个注中说:他用来作该

论文集名称的“语言转向”,据他的考查,是“伯格曼(Gustav Bergmann)自己新创的术语”。^① 伯格曼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因而可以说是分析哲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文章中使用了“语言转向”这个词。罗蒂引用伯格曼的话来解说什么是“语言转向”的含义:

“所有的语言哲学家都通过谈及适合的语言谈论世界。这就是语言转向,即基本的方法论上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日常语言的哲学家和理想语言的哲学家都赞同。同样基本的是,他们之间在有关‘语言’是什么和什么样的语言才是‘适合’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一个哲学家当然可以进行这样的转向。但问题是他为什么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为什么这不仅仅是令人讨厌的兜圈子?我将提出以下三个理由。(1)词要么日常地(符合常识地)使用,要么哲学地使用。这一区分在方法论上至关重要。然而,前语言[转向]的哲学家(the prelinguistic philosophers)不进行这样的区分。他们哲学地使用词。显然,这样的使用是不理智的。这些用法需要给予常识的说明。我们可以为此提供这种方法。……(2)前语言[转向]的哲学中的许多悖论、荒唐性和晦涩性来源于不区分说和关于说的说。这样的错误和混乱比人们所设想的更难避免。(3)对于某些东西来说,任何可设想的语言只能显示(Show)它们。在此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用文字来表达;宁愿说,正确地(和安全地)谈论它们的方式是谈论语言(语言的句法及其解释)。^②

伯格曼在这里所说的前语言的哲学家是指他所说的语言转向之前的哲学家,或不懂语言分析方法的哲学家。他列出了为什么要进行语

① Richard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语言转向》),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First Phoenix Edition 1970, p. 9.

② 转引自同上书,第8—9页。

言转向的三点理由。按照罗蒂的看法,“这些论证是实践的论证,而不是基于对语言的性质或哲学的性质的思考的理论的论证”。^① 罗蒂在编这本论文集的时候,他所考虑的问题已经不是像伯格曼一样停留在论述语言转向的意义的层次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对这一转向本身的可能性和限度的评价上。罗蒂的这本论文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有关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的论点的经典表述”。第二部分的标题为“理想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第三部分的标题为“日常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第四部分的标题为“重估、再思和展望”。在这四部分中,只有第一部分的论文谈有关语言转向对处理哲学问题的意义,而作为该论文集重点的第二、第三部分谈的是理想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这就是说,语言的建构和运用本身蕴涵着哲学问题,它不但没有脱离被某些分析哲学家所拒斥的哲学问题,而且是以承纳这些问题为前提的。当分析哲学家建构一种理想语言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按照经验主义的立场来建构的,这就把经验主义的哲学观点带到了这种理想语言中去。当分析哲学家分析日常语言的用法的时候,他们所持的哲学立场也会影响到他们对语言的分析。这就是“语言转向”中的元哲学问题。对于提出“语言转向”的口号的许多早期的分析哲学家来说,他们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认识到消除哲学问题并不是那样简单。罗蒂的这本书实际想表明的是“语言转向”的意义及其问题,并且重点落在论述它的问题上。

在以下的各章中,我们转而逐一介绍分析哲学家的思想,看看他们各自是怎样完成这种语言转向的。

^① Richard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p. 9.

第二章 弗雷格：现代逻辑之父

当我们论述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时候，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位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iedrich Ludwig Frege, 1848—1925）开始，看起来有点离题，但为把握这一哲学运动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得不如此。这不仅因为现代逻辑（指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是由他奠基的——没有这种现代逻辑，就谈不上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批判的方法；而且还因为当代许多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经典问题，也是首先由他开始研究的。

弗雷格是名副其实的现代逻辑之父，并且也是现代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开创人。他是数学基础研究中的“逻辑主义”（Logizismus）的发起人。他也是现代语义哲学的最初的探索者。作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弗雷格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后来称之为“分析哲学”的新的哲学思潮的开创者呢？这是因为他对现代逻辑的构想是建立在他对逻辑和语言中存在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他在构造人工语言时遇到那些有关逻辑哲学和语义哲学的重大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不论被以后的分析哲学家接受与否，已经成为分析哲学史上反复讨论的经典范例。

弗雷格自己只认为自己是一位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他没有想到过他的名字会与分析哲学联系在一起。但是“分析哲学”运动的一个源头确实是来自弗雷格的创造性思想。许多分析哲学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直接受到了弗雷格的影响。他们吸收、解释和改造了在弗雷格的著

作中最先论述的新思想。尽管他们中有些人不同意弗雷格的某些观点,对他进行了批判,但他们自己的观点说到底还是来自弗雷格的新思路的激励。在分析运动中,从弗雷格到其他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之间存在一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弗雷格的研究的主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哲学观点加以解释、修补、扩充、批判乃至重起炉灶的过程。

早期分析哲学运动的三位重要思想家,即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都承认直接受惠于弗雷格。他们都与弗雷格有过学术上的交往,对弗雷格的工作都有深刻的了解,并受到弗雷格思想的强烈影响。

罗素是最早对弗雷格的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并发现它们的重大意义的分析哲学家。在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第一卷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主要是从弗雷格那里获得教益。”^①

当维特根斯坦开始关注数学的基础问题的时候,他写信向弗雷格讨教,并于1911年专程去德国耶拿拜访弗雷格。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写道:“我只想提到,我受惠于弗雷格的巨著和我的朋友伯特兰·罗素先生的著作,它们在颇大程度上激发了我的思想。”^②

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可以说是弗雷格的学生。他在1910年年底和1913年及1914年夏天听过他的课。当卡尔纳普从德国移居美国后,就把弗雷格开创的数理逻辑带到了美国。

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罗素发现了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的数论体系中的悖论。1902年6月11日,正当弗雷格的《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二卷(*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II*)付印之际,罗素给他写了一封信。罗素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但同时指出他的逻

① A. N. Whitehead / B. Russell, *Principia Mathematica*, Bd. I, Cambridge, 1910, p. VIII.

②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24页。